

陈子谦 著

钱学论

(修订版)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陈子谦 著

J206.7

383-1

钱学论

(修订版)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 111 号

钱 学 论
(修订版)

陈子谦 著 责任编辑 吴景岚 刘进 陈之定

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北京·北太平庄·北三环中路 46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装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24 字数: 476 千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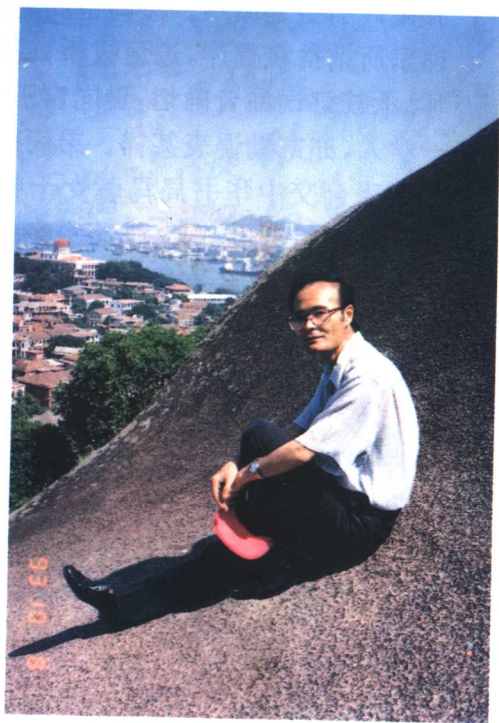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0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41-1124-4/G·1081

定价: 18.00 元

作者简介

陈子谦，湖南隆回人氏，一九六三年毕业于隆回一中，一九六八年毕业于武汉大学，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厦门大学，现任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从小爱作文学梦，追求友谊和真诚。修过马路，炼过钢铁，下过连队，呆过农场，青春献给了瞿垓峡两岸的山山水水。工作十年后重返大学，一头扎进钱学领域。曾先后在《文学评论丛刊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学遗产》、《文学评论》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，获得前辈学者和读者好评。



钱钟书先生给本书作者的信

子谦学人我兄著席：

奉书感喜。弟兼贪多与爱好之病，所论述皆发其端而未竟其绪，于劬学精思如兄者，拙著或有抛砖引玉之微功。然尚望高著眼，远放步，如禅宗所谓捨筏登岸，过河拔桥，视拙著如刍狗可耳。承校订误漏皆确切，贵同窗王君依明又沪上一学人，亦寄勘误表甚详。弟病后心力衰退，拟将诸表合交中华书局马蓉女士整理，待第三版中改正。然纸价日高，拙著愈畅销，而中华则愈折本。第二书又各有增订数万言，未识何时见天日耳。郑先生来京过谈半日，甚快亦甚美兄之才。草此复谢，即颂春釐。

钱钟书敬上 杨绛同候

二月九日

子謙學人我兄著席奉

書中言立中其意多與愛子之病相所
近述皆及至端而未竟其緒幼學精思
思免者此著中只引至之微可
益為望 弟著眼遠放步以禪宗所
謂捨筏登岸道以拔擢視此著如
易狗子年一校訂誤漏皆確切資
因窗王君修民又匯上一學人亦多勸讀
表甚詳中病後心力漸退擬將諸書交
中華書局馬增士整理錄第三版中改
正紙價日高故著 廣福鋪而中華則愈折
本中更且云又各乃該行書要云未識何見云
身 鄭先生素氣過淡半日世快心也之云
弟此以例即以此奉 鑒
錢敬上 楊海月候
二月九日

钱钟书先生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手迹

序

古人尝言：太平之世，多长寿之人。钱钟书先生**迎道**生平，去年已过八十华诞；郑朝宗先生坎壈身世，明年亦满八十退龄。非高资大力，孰能如斯！非德备君子，孰能如斯！《诗·小雅·蓼萧》云：“其德不爽，寿考不忘。”此之谓欤？吾尝有专文略陈纪念钱先生诞辰之意，而无一字为吾师朝宗先生寿，未尽弟子之谊，心存愧疚。祝寿唱赞，为两位前辈所不许，而该书付梓，仍寓此微忱，尤欲昭示吾师于“钱学”研究肇创之功也。

二前辈同为清华门人，亦同为留英学杰（一牛津，一剑桥）^①，胥博洽古今，融通中西。尔后虽南北异处，亦寄慨同心，清交素友，至老不渝。其学德人品，堪为一代师范。钱先生以世罕伦偶之学而甘居寂寞，郑先生以散文超拔之才而不求人知，一是“凋疏亲故添情重”，一是“飞

① 二“同为”，前指先后同学，后指皆喝过洋墨水。钱先生1935年秋偕扬绛女士赴英，1937年秋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，1938年9月回国。郑先生1949年7月赴英，1951年2月回国。

红坠地护春花”，无一非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者。

吾生也有幸，得以亲炙郑门而私淑钱学，仰尊容、慕德操，翘首褰裳；勤诲恩、吐握情^①，沃灌我心。吾受业郑师三载，注慕钱学经年，虽颛愚固陋，所获甚微，抑亦性之所乐而亦情之所归也。苏轼《自笑》诗云：“多谢中书君，伴我此幽栖。”^②亦可聊借自慰欤。尔来有年矣：二前辈或腹笥发授，或时致来简，皆殷望大成，勉督情深，吾未尝不休惕惟厉，奋怀志学，夙夜勤止，努力以赴。然终因先天不备，后天不足，徒见笑于方家，获罪于前贤耳。

撰《钱学论》一卷，实则钱学锥指，非敢发为高论也。吾侪曾受论文一偏之训练，动辄一论再论，大论特论，论有程式而几成“八比”，论出无稽而多为“空观”，即“纷华始满眼”，亦“消释不旋踵”（王安石《和吴仲卿雪》诗语），洵足戒也。吾闻禅门说法有言：“多虚不如少实”；司空图论赋亦曰：“侈其虚而歉其实”；钱先生引康德驳“本体论证”至云：“一百元之概念终不如一百元之实币能增财富也。”夫针砭之痛言，亦可为对症之药言，吾又焉能以宏观空论为之耶？而吾今既作

① 一九八四年五月，我应邀参加《中国社会科学》青年作者座谈会，到京后即向钱先生发一信求见，钱先生立复一函云：“奉书惊喜，当抽空在舍恭候。”二十五日下午，钱先生政协会议小组讨论告假，乘接见外宾空隙，如约于国务院公寓钱先生寓所接见我，我有幸聆听先生畅谈一小时有余。

② 钱先生曾用笔名“中书君”。

《钱学论》，复何出此言哉？无乃矛盾自攻乎？

书名之称，非我本意。盖论之为言，大言、卮言、汗漫之言，素为钱学所嘲；而论之为名，掠名、虚名、赫赫大名，亦似与钱学乖互，此余所以惴惴不安者一也。又所谓《钱学论》者，吾固当于钱学作“方览圆闻”，全面而深刻论列之；然则纓短汲深，管孔入览，粗迹浅见，识昧圆通，何足语于洞究之论。虽说尝一脔而知全鼎，品一滴而知海味，而钱学之汪洋恣肆，博大精深，洵明道先生《秋日偶成》第二首所言：“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”。故欲掇摭弗失，而终成鼯鼠饮河，即穷气尽力，亦不过满腹而已，即优求玩索，亦不过自适而已，岂敢期望“观海诸君知浩渺”哉。此余所以惴惴不安者二也。今钱学已成热门话题，讽诵撰述者亦不乏钱先生所讥“鳖斯踢”^①，抑“汉语胡言”而“争雄笔阵”、“侈炫边鄙”，犹范晔著《后汉书》自唱：“乃自不知所以称之”者。顾乃幸赖前辈申导学义，一批新秀比肩而起，且论著煌煌，蹊径别开，探幽寻隐，胜景先揽，吾实有李白登黄鹤楼，见崔诗在上而有景题不得之感。此余所以惴惴不安者三也。以此三端，而书称《钱学论》，吾期期然以为不可。故初以《钱学拾义》、后又以《钱学管窥》送呈，窃以为或可略得

① 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事部载：“东坡与温公（司马光）论事，偶不合。坡曰：‘相公此论，故为鳖斯踢。’温公不喻其戏，曰：‘鳖安能斯踢？’曰：‘是之谓鳖斯踢。’”比喻不晓义理而蛮凑强攀。

体要。

然而四川文艺出版社诸君言出一口，将我种种考虑概予否定。且理由十足，言之侃侃：“拾义”太雅，“管窥”太俗；并三复其言：“管窥”之说，已成谦词匡格；“钱学”之“论”，尚是“未发境界”^①，正宜撮其大要，彰明尤最，发端引绪，以飨读者。人有作“海样言语”者，今著一“论”字而不敢，何小家之气云乎哉！吾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以坚意不从始而以固辞不获终。此书名之所由来也。

夫一书之编撰，非惟一己之微力。吾是编之撰，尝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敏泽先生所关注。该书《引论》与上编前五章，即以提要形式刊布于敏泽先生主编之《文学评论》。其余部分章节之部分内容，亦先后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书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评论选刊》、《文学遗产》、《漳州师院学报》等报刊刊发或转载。承蒙徐公持先生、朱成甲先生、申坚先生、舒展先生、林继中博士、肖敏女士等众多专家学者之眷眷顾念，奖掖除擢，胥为吾未能忘怀于须臾者也。文行之后，丹东王月，北京李洪岩，湖南冯天亮，湖北郭书桥等青年学子和读者，波恩大学汉学家、《围城》德译者莫妮克博士（Monika Motsch），或撰文表彰，或辱书来教，真乃杜甫所谓：“文章有神交有道，端复得之名誉早。”（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酒歌》）其间王月君与吾鸿雁往还八有一年矣，至今缘慳一面；诸余贤

① “钱学”非女人之花眼含眸，想此说必为借词申义。

士亦皆素昧平生，只因笃爱钱学而心有灵犀，尤令我感喟不已。当斯时也，我将诸多前辈、同辈与夫后秀之英名书之弁首，自省非为孔子之言“吾从众”；亦非仅与“文人相轻”之恶习抗衡；至若邀名声、壮门面、抬身价，则非所思存；而实为他日之忆，亦有以自考耳。

书稿未定，吾突发痼疾，痛醒之后，恍若隔世，一时已无力勘误纠谬，斟酌损益。瞥观所记，可谓“才乏俊颖，思多昏滞”。“说诗解颐”之讥，吾或弗免。“握管迟回”之叹，吾亦有诸。誉我罪我，任之听之，听之改之也，端赖前贤后秀有以拂吾心之陋焉。

吾于病中，除家人细心照料，吾犹要特致谢忱者，一为四川社科院院长刘茂才教授，二为同院工会刘广州主席，三为同院职工李美武君，或亲施针灸术，或延请气功师，或按摩减痛以至通宵达旦，其慰抚之深切，关怀之情重，尤令我铭刻五内者也。又有云南人民出版社李巍君，上海人民出版社诸仁，长途电询，祈祝康复，情谊之厚，亦可歌可泣。该书得以问世，尚须感谢四川社科院领导和科组处鼎力支持。无诸多志士仁人之恩勤顾育，该书作者之力，庶为唐捐矣。此吾所以抚卷动容，一并志于卷端之由尔。

辛未年（一九九一）九月子谦自记

引论：关于“钱学”



《管锥编》第四册《全晋文》卷论郭璞云：

又按《〈尔雅〉叙》结语：“辄复拥彗清道，企望尘躅者，以将来君子，为亦有涉乎此也”；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结语：“茫茫前代，既沉予闻，渺渺来世，倘尘彼观也！”；刘知几《史通·自序》自言“《法言》以降，迄於《文心》而往”，皆“纳胸中”，结云：“将恐此书，与粪土同捐，烟烬俱灭，后之识者无得而观，此余所以抚卷涟漉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！”，则与《文心》同调。著书心事，不外此两端，读二刘语而悲者，得以郭语解之。

从这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窥探到一点钱先生之“著书心事”。郭璞所注之《尔雅》、刘勰之《文心雕龙》、刘知几之《史通》，早已成为各知识领域中的研究者人手必备的著

作,这说明一切经得起时间推排消蚀的作家和著作,是不会被后人忘记的,他们的“拥慧濠道”之功,决不会尘封水淹、“与粪土同捐”。可以断言,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等巨著,将和郭璞二刘的著作一样,与天地日月共长久!

事实上,钱先生是有幸者,他没有陶潜、李白、杜甫或莎士比亚等大家巨子身前的寂寞,尽管他是那样寂寞自甘^①。国内自从郑朝宗、周振甫、侯敏泽、蔡厚示、林兴宅等学者倡导研究钱钟书的著作以来,海内外响应热烈。郑朝宗先生率先在《文学评论》1980年第6期发表《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》的长篇论文,全面评介《管锥编》的文评特色。继郑朝宗先生之后,我曾于1982年在《文学评论丛刊》(文艺理论专号)第14辑发表《试论钱钟书“以实涵虚”的文艺批评》^②,随后又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83年第6期发表长篇论文《试论〈管锥编〉文艺批评的“一与不一”哲学》。1983年《厦门大学学报》增刊(社科版)集中发表研究《管锥编》的一组论文。1984年郑朝宗编《〈管锥编〉研究论文集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,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钱学的专书。自此以后,国内一批学术型的作家,如黄裳、柯灵、王蒙、舒展

① 郑朝宗先生曾将钱钟书先生的赠诗示我,诗云:“凋疏亲故添情重,落索身名免谤增。”又见舒展《钱钟书谢绝“龙”喻》一文。

② 这是郑朝宗先生在1981年暑假对几位研究生进行开卷考试的命题作文,我完稿于四川奉节。

等同志，或作报告，或办讲座，或著文，在各种场合宣传钱学，初步形成钱学研究的热潮。有的同志甚至把钱钟书比喻成“文化昆仑”^①，这更增加了人们对钱钟书及其著作的仰慕。王蒙说：在钱先生那里，既无“自由化”又无“僵化”。言下之意则是：钱学是知识化、科学化和人格化的象征。一大批青年学子则从《围城》的迷恋中走向钱钟书的学术领域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学术界、出版界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，除前面提到的以外，还有傅璇琮、庞朴、李希凡、钟叔河、黄克等先生，顺应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，积极发起和支持创办《钱钟书研究》丛刊。国内一个可喜的现象是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行政领导人，也尽力支持这一研究，不用说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努力提供钱学研究成果面世的方便条件了，因为他们都懂得“钱学”的含义和价值。在国外，有的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钱学研究机构，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也陆续被翻译成英、日、德、法、俄等多种外文出版。八十年代初，一西方学者发出如此赞叹：钱钟书是当代“最伟大的智者之一”^②。“智者”，是明哲睿知者的称号，古希腊罗马哲学有所谓“智者派”，后世称古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苏格拉底、亚理斯多德等人为“智者”。我国亦有此称。有识

① 舒展：《文化昆仑——钱钟书·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》，《随笔》1986年第5期。

② 《美国作家评杨绛〈干校六记〉》，金德万摘译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《文学研究动态》，1984年第6期。

之士对钱先生这一评价和赞誉是值得我们自豪的。“钱学”，这是我们民族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珍品，足可雄视于世！因此，它必然地不会落入刘彦和、刘知几所忧虑的结局。钱学研究的目前状况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

但是，所有了解钱钟书先生或认真读过他的书的人都知道，钱钟书对于学术以外的毁誉是不大介意的，无论是“心服之赞词”还是“心痒之恨词”，都不能入其心胸，尤其对于那些大而无当的“褒夸之词”，他认为只不过是矫情缘饰而已，“吾望而却步矣。”^①国内好心的学者曾期望“钱学”能迅速得到“普及”，以救某些小说、诗歌、影视在美学意境方面的肤廓粗浅之病，但立即遭到钱钟书的反对。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“普及化”往往坠入“庸俗化”。欲提高我们民族的鉴赏力（审美能力和思辨能力），读钱先生的书的确会获益良多。然而学术文章乃天下公器，会心者可以得之。否则，“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”^②后来钱钟书听说要创办专门研究他的杂志，他力阻无效，几至病倒！这在他人，是求之不得的美事；对于钱学爱好者，也不啻一大福音，钱先生何至于固执若此？这是钱钟书习性最顽强的表现，是“钱学品格”最现实的证明。而其深层的原因有三：

一、“拜倒于”很可能成为“拜之倒”，“学师”很可能变成“累师”、“背师”。（详本书第三章，此处从略）

① 摘自钱先生给笔者的一封信。

② 曹丕：《典论·论文》。

二、学问之事不是大喊大叫的东西，它有其自己特有的属性，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和接受的属性。它甚至是令人十分苦恼的事，没有非凡的毅力，不可能持之以恒。钱钟书说过，读书人如叫驴推磨，苦了累了，抬起头来嘶叫两声，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，依然踏着陈迹。当然也有不老实者，感到厌倦后悔者，有如朱熹体验过的那种“书册埋头无了日，不如抛却去寻春”的情绪，干脆捐书不读。真正的读书人、学问家，不会如此悔恨。甘于寂寞如钱钟书一辈，决不为外物所诱。我曾引傅雷先生的那句话：“没有肉体的静止，不可能有思想的深刻。”是十分有道理的。孟子早说：“无恒产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”^①刘禹锡亦言：“耿介之志，惟士得以行之。”^②

三、一切学问，一旦成为市声嚣然的奔赴竞争之具，无论怎样显赫一时，都必将成为庸俗不堪的东西，充其量也不过“雅得那样俗”。董其昌引黄山谷说弟子语：“士生于世，可百不为，惟不可俗，俗便不可医也。”^③正是有慨于市廛庸夫的所做所为。钱钟书说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^④因此，“钱学”是和“俗学”截然相反的学问。

① 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。

② 刘禹锡《明赞论》，《全唐文》卷六〇七。

③ 《画禅室随笔·杂言》下。

④ 见郑朝宗《钱学二题》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1988年第三期。

郑朝宗先生说：“什么叫‘俗学’？依我的理解就是庸俗化了的‘显学’。大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况，每当一种新学说或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出现时，其国之学者群趋若鹜，争相研诵，然后著为文章，各抒己见，由于各人水平不同，其高者探骊得珠，与作者意会神合，其低者仅得皮毛，甚至充满误解曲解，使原作面目全非，把‘显学’变为‘俗学’的正是后面一种人。”^①就“钱学”研究而言，最现成的例子莫过于将它与“禅学”、“红学”、“金学”（《金瓶梅》），甚至所谓“龙学”相提并论了。将此称为“痴人说梦”是丝毫不过份的。

一书而为“学”，甚至一部小说而为“学”，是钱钟书早就予以否定了的谬说。你当然可以不赞同钱先生的意见，但既言“钱学”，怎么可以不遍观钱著而妄加评点下“大判断”、作“小结裹”呢？“仁智之异见与酸咸之殊好，不可混为一谈”^②。所谓“禅学”，特别是所谓“龙学”云云，“莫非望文生义，因声起意，由误会而成附会”^③。作这种媚俗惑世之谈，正是“流风未沫，危言日出”^④所致，可与“夔一足”之类牵扯葛藤，而与“钱学”了无干涉。钱钟书说得很清楚：

文章中一书而得为“学”，堪比经之有“《易》

① 郑朝宗：《钱学二题》。

② 《管锥编》第二册《太平广记》卷论“名同分异”。

③④ 《管锥编》第三册《全后汉文》卷论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。